

但“中进美退”态势仍面临难以预期的变数。2018年5月马来西亚大选后马哈蒂尔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化就证明了这一点。美国对柬、菲、缅的影响力仍然很大，三国中仍有很强的亲美势力存在。不过，当前中美在东南亚的博弈并非零和游戏，目前仍处在一种“竞争性共存”阶段。对中美两国而言，当务之急是采取措施避免让日趋激烈的博弈演变成零和游戏。

中美在东南亚影响力“此涨彼消”的原因有三。一是美国在东南亚投资减少、贸易份额下降。失去强有力的经济支撑，美国在东南亚的政治军事影响力就不会持久。二是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投资日益增加，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正在东南亚深入推进。中国在东南亚经济力量的增长必然会带来政治影响力的拓展。三是美国的“人权外交”与东南亚国家的现实需求差距太大。菲缅泰等曾经倾向于美国价值观的国家都因在国内人权问题上受到美国压力而转向中国；而中国则照顾到了东南亚国家内部治理中的现实困难，不会就人权和治理问题向东南亚国家政府单方面施压。

面对大国在本地区的激烈博弈，

东南亚国家采取“大国平衡外交”，强调东盟“中心地位”，弘扬团结精神。东南亚国家除印尼有大国潜质外，其他国家都是中小国家。中小国家一般都希望在大国之间保持“等距离外交”，并在大国博弈中采取“左右逢源”的外交政策选择。东南亚国家不希望任何一个区域外国家主导该地区的事务，更不希望中美博弈迫使区域内国家“选边站”。在2018年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新调整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东南亚国家提出东盟版的印太愿景，试图维持东盟“中心地位”。作为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群岛国家，印尼在东盟版印太愿景中扮演着主要推动者角色。2018年1月，印尼外长蕾特诺提出印太地区架构设想，强调开放、透明、包容原则，坚持对话和合作的大方向。印尼的这一举动表明其对美国等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感到不安，试图提出另一种以东盟为中心的印太愿景。在2018年8月的东亚峰会外长会上，印尼第一次完整地阐述了其印太前景和印太合作原则。印尼倡议的东盟版印太前景，意图强化已有的东盟主导的机

制，从而为东盟“中心地位”提供新的动力。

二，东南亚国家在大国战略博弈中采用议题性选边策略，以谋取利益最大化。它们根据政治、经济、安全等不同的议题，采取不同的对美和对华政策。如越南在经贸、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开展与中国的合作，但同时与美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关系也在升温。

三，东南亚国家对中美两国的外交政策调整速度加快。东南亚国家都奉行“大国平衡术”，但同时也在实际外交政策操作上对中美分别采取了拉近或拉远的做法。柬菲缅泰四国对美保持一定距离甚至拉远与美距离，提升对华关系。印尼、文莱、老挝三国与中美均无矛盾和冲突，与中美均保持友好关系。越南和新加坡是长期主张纳入美国制衡中国的国家，这两个国家在2018年对中美均提升了双边关系。大选后的马来西亚新政府改变了原政府对华较为紧密的关系，拉远了与中国的距离，同时积极与美国及其亚太盟友展开互动。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 中国与周边国家继续领跑全球经济

文 / 钟飞腾

自21世纪初起，中国外交布局明确为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周边。中国官方文件通常称谓的“周边”，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以及阿富汗，包括日本，但不列入俄罗斯，共有28个国家。

在全球主要大国中，唯有中国拥有如此众多的海上和陆上邻国，鉴于中国独特的地缘环境，跟踪和分析周边经济的变化，对于推进中国外交具

有重要意义。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上阐明了经贸关系深化发展推动外交工作转变的逻辑：“我国同周边国家的经贸联系更加紧密、互动空前密切，客观上要求我们的周边外交战略和工作必须与时俱进、更加主动。”

近两年全球经济形势继续走低，中美贸易摩擦引发全球关注，但中国周边地区经济发展态势令人刮目相

看，继续领跑全球经济。近两年来，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一个显著变化是，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更密切，与发达经济体的经贸关系下滑。我的几点看法是：

第一，中国对外经贸格局基本稳定、并无人们议论纷纷的“脱钩”情况。据中国海关2019年1月下旬发布的数据，2018年中国与周边28个国家的贸易额为1.4万亿美元。同期，中国与

亚洲、与世界的贸易额分别为2.4万亿美元和4.6万亿美元，中国同周边国家的贸易额占中国全球贸易的30.7%、亚洲贸易的59.7%。

周边占全球比重稳定、但占亚洲比重略有上升。2016年中国同周边国家的贸易额占中国全球贸易的30.7%、亚洲贸易的58.0%。也就是说，中国周边经贸板块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位置并无变化，但在亚洲经贸格局中的占比增加了1.7个百分点。因此，并未出现一些媒体议论的所谓中国正在与发达经济体“脱钩”的趋势。

如果考虑中国大陆与港澳台经贸额，甚至可以说中国大陆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关系还在进一步强化。2018年，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合计为5400亿美元，比2016年增加约500亿美元。加上港澳台地区，2018年中国与近邻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为42.4%，而2016年占比为43.9%。

第二，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的经贸关系日趋紧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重心在东亚，而目前的趋势是东北亚权重略有下降，东南亚仍在上升。从贸易额来看，2018年中国与韩日两国为6400亿美元、与东盟十国约为5900亿美元，这两个区域占中国周边贸易的比重分别为45.1%和41.4%。与2016年相比，日韩占比下滑了1.5个百分点，东盟占比上升1.4个百分点。在周边经济体中，贸易额超过1000亿美元的国家有日本、韩国、越南和马来西亚，其中中国与越南经贸关系日益密切，2018年中越贸易占中国周边贸易首次突破10%。

除越南之外，推动周边板块地位上升的还有印度尼西亚和印度。2018年，印度列中国周边贸易第五位（6.7%），超过泰国和马来西亚。印尼列第八位（5.4%），占周边贸易比



2018年11月15日第33届东盟峰会及系列会议在新加坡落下帷幕。

重较2016年上升0.7个百分点，上升幅度仅次于越南。尽管周边板块在中国外贸格局中的位置仍很稳定，但是内部格局却在悄然发生变化。正是这种变化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不可避免正在改变东亚的生产链，越南和印尼地位突出。另一方面，中国与印度关系的改善对于推动中印经济关系发挥了作用。

中国政府推动进口也对拉近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起了作用。2018年，中国向周边国家出口7200亿美元，进口7020亿美元，贸易顺差不到200亿美元，占整个周边贸易比下降至1.2%，比2016年缩小4.4个百分点。越南、哈萨克斯坦、印尼、缅甸、印度、蒙古和土库曼斯坦的进口增幅都比2016年有所提升。

在整体向好态势下，我们也不难发现若干国家与中国的经贸关系紧密度有所下降，除了前文提及到的韩日之外，比较突出的是马来西亚、孟加

拉国和朝鲜，当然原因各不相同。马来西亚明显是因为国内政局变动，马哈蒂尔哈执政之后大幅度减少参与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的力度。孟加拉国的主要挑战是贸易增速显著落后于中国周边贸易的平均增速，特别是如何加大对华出口是个重大挑战。朝鲜是近年来对华贸易减少的几个国家之一，其他包括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和东帝汶等四国，但朝鲜对华贸易相较于2016年的减幅为29亿美元，是上述四国的7倍多。联合国对朝鲜的经济制裁是主要原因。

第三，中国周边经贸发展仍将引领全球。对于中国经贸的外部环境来说，最重要的区域依次是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增长前景乐观。世行认为，东亚太平洋地区仍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地区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去年10月发布的报告中也认为，新兴亚洲和新兴欧洲（土耳其除外）的增长预测依然有利。

在世行所界定的区域中，“东亚太平洋地区”和“南亚地区”2018年的经济增速分别为6.3%和6.9%，2019年经济增速预计分别为6.0%和7.1%。IMF所界定的“新兴和发展中亚洲”包括30个经济体，主要是东南亚11国和太平洋岛国，IMF预计2018年和2019年的经济增速分别为6.5%和6.3%。

与中国经贸关系非常紧密的东盟五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预计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增速在5.2%左右。

也就是说，中国、印度以及东盟这一区域仍将是全球增速最高的区域。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报告也指出，2018年东北亚和东南亚的

外资流入增速分别达到2%和11%，占全球的1/3，引领全球投资流动。就此而言，随着中国以“一带一路”为顶层设计，加快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将更加稳定和深入。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 新时代中国周边人文外交

文 / 许利平

人文外交是新时期中国特色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中国周边外交目标的重要路径，它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我要谈的第一点是人文外交的定位。推动人文外交，首先要做好三方面的定位：

一是基础性。人文外交外延很广，涵盖的领域非常多。一般来说，它可以包括文化外交、智库外交、教育外交、体育外交、青年外交、科技外交、媒体外交、旅游外交等。对于我们的周边外交来说，它们都是基础性的，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夯实中国对周边国家的民意基础、社会基础。

二是亲和力。因为人文外交的元素是人文元素，应该是柔和友善的，目的是要加强中国和周边国家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尊重，达到民心相通。

三是持久力。人文外交不是短期的，它应该更多地聚焦于长远的战略利益，“润物细无声”地发挥作用。周边人文外交的项目也更多地应该是长期项目，并且常态化。

第二点是新时代中国与周边人文外交的特点。

我认为，中国周边人文外交是实践先行，理论滞后。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和各个部门都在自觉不

自觉地推进周边人文外交，这些实践可谓精彩纷呈。例如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圣水外交”。2006年7月中印两国重新开放两国边境的乃堆拉山口，恢复中断40多年的边贸通道，2014年9月中方同意向印度增开乃堆拉山口的朝圣路线，便利印度香客赴中国西藏神山圣湖朝圣取水。目前印度香客有多条入藏朝圣的通道。圣水外交对印度的影响非常大。对此我们很少宣传，但实践活动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

再如中国在东南亚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经常推行的“光明行”活动，即中国派出医疗队给当地白内障病人进行手术使其复明的工作。

又如与缅甸等国之间多次进行的舍利子外交，取得很大成功。中国保存的佛舍利子在缅甸的展览，吸引了缅甸众多佛教徒参观拜谒，取得了缅甸佛教徒高度认同，极大促进了双方的民心相通，非常成功。

但是我们对周边人文外交的理论化研究应该说现在还处于起步阶段，与广泛的人文外交实践还不匹配。迄今我们国家还没有正式提出人文外交的理念，而且国际上也没有人文外交这个概念。那么，人文外交到底是什么，与公共外交是什么关系，需要从理论上进行阐释。

近年来我们建立了很多高层的人文交流机制，例如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中，我国与印尼在2015年建立了两国副总理级的高层人文交流机制，这是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建立的第一个高层人文交流机制。我们还与周边国家还建立了很多各种级别的高层人文交流机制。以这些机制为统筹，人文外交得到有效地推进。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人文交流机制倒逼着周边人文外交的推进。

个人认为，文化外交是人文外交的核心。我们可以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共性或文化认同，挖掘文化资源，推陈出新，推出具有创新价值的文化外交的新品牌。

智库外交是指一个国家制度性地吸纳智库及其人员参与决策、执行、监督、评估等外交过程。十八大以来围绕“一带一路”、朝核危机、南海问题、中印边界对峙等热点议题，开展了不同层次的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

新时代中国周边教育外交风生水起，通过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中国—东盟教育周、孔子学院或孔子课堂等教育交流与合作平台，开展中国周边教育外交。

青年外交目前主要依托团中央进行。例如，中国与周边国家举行“百